



·博物馆学研究丛书·

遗址博物馆学概论

主编 吴永琪

李淑萍

张文立



《博物馆学研究》丛书序

博物馆可以说是一种既古老而又年轻的事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早在公元前3世纪，缪斯庙便存放了收集起来的珍品。在中国也一样。所以，孔夫子一入太庙，也要“每事问”了。让孔夫子要“每事问”，大概就是因为它的收藏博了一点吧。博物二字，春秋时晋侯称子产为“博物君子”。汉代班固称孟子、荀子、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到今天我们则称收藏并展出的单位为博物馆。西方则叫MUSEUM，其语源也出于收藏珍品的缪斯庙(MUSEION)。在这一点上，中外思路大体一样。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博物馆，则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在欧洲，法国大革命后，将王室的艺术珍品收集起来，在卢浮宫建立中央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在中国，一般认为是1905年，具有进步思想的张謇办的南通博物苑，开始了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事业。所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的诞生，在西方才200多年，在中国不到90年。这便是说它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一种文化事业的原因。到现在，世界博物馆事业在不断发展，已有30000多座，中国的博物馆也已有1100多座。

实践呼唤着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紧紧追踪着实践。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要求研究者给它以理论的阐发。国外在 1904 年便出版了关于博物馆研究的著作。我国老一代的学者，也在本世纪 40 年代出版了博物馆研究的专著。但是，对博物馆能不能成为一门学科，国外国内，也有不同看法。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博物馆学的理论还不成熟，它是一门学问，还不是一门科学。”国内学者中也有这种看法。这不奇怪。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系统化、理论化，博物馆学自会立足于科学的殿堂。由学问到科学，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不论中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把博物馆学当做一门科学去对待的。要不然，那么多的关于博物馆学的研究论文及专著便无法理解了。学者们的实践活动，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在博物馆学的研究中，“特别致力于博物馆学的定义、概念和范畴的再研究，力图对博物馆的性质、多职能的复杂现象和不断发展着的进程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博物馆学的多种分支学科的建设方兴未艾”。作为一个博物馆及在博物馆工作的人员，应该责无旁贷地关注并投入到博物馆学的研究中去，为发展博物馆学的理论体系，促进博物馆的建设，尽绵薄之力。这便是我们编辑和出版这套《博物馆学研究》丛书的初衷。

在博物馆这个大家庭中，近年来人们特别垂青于遗址博物馆。它是我国博物馆中增长最快的一种类型的博物馆。从趋向来看，还在发展中。它将是我国博物馆事业中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对遗址博物馆学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的实践意义。遗址博物馆的基本特点是拥有遗址。博物馆是因遗址而建。遗址是整个博物馆的主体。博物馆的一切业务工作

及其他工作都要围绕遗址来进行。有的学者提出遗址博物馆学这个博物馆学的分支学科，就是希望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遗址博物馆的性质、任务、特点、陈列、讲解、科研、保管、保护、保卫及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这一研究又可以丰富博物馆学的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是一个遗址性的历史专题博物馆，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自应有更多的关注。因此，在这套丛书中，遗址博物馆学的研究分量适当地就偏重一些了。

这套丛书我们计划编写十册左右，内容包括：博物馆学研究论文选、博物馆学研究论著要目、遗址博物馆学概论、遗址博物馆讲解艺术、遗址博物馆技术（保管、保护）、遗址博物馆陈列、管理等。我们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这套丛书编好，使之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博物馆事业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94年，是秦兵马俑坑发现20周年及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15周年。我们就让这套丛书开始出版，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时刻。

我们追求尽善尽美，但是要达到这点殊非易事。我们期待着同行的针砭。同时，我们也感谢参与本丛书的作者的辛勤劳动，也感谢出版社及编辑的热情关怀。

《博物馆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1994年1月

序一：

大书与小书

——为《遗址博物馆学概论》出版作

宋伯胤

五十三年前，当我从学校大门走进博物馆殿堂后，读到的第一部关于博物馆的专著是陈端志先生的《博物馆学通论》，当时的感觉它是一本侧重介绍外国博物馆经验的书，专业术语又晦涩难懂。其后，读到曾昭燏、李济两位先生合著的《博物馆》以及蔡元培、杨钟健先生几篇论文，对我确有顿开茅塞之感。特别是蔡先生发表在1922年《教育杂志》上的一篇题为《美学实施方法》的论述，对我更是有着既新鲜又无尽的魔力。由是，我不仅接受了蔡先生提出的两个观点，信守不渝，而且还努力实践，用来检验自己的工作。这两个观点是：一、“教育并不是专在学校”，博物馆是“新式教育”；二、凡接触耳目的陈列品，建筑形式和环境布置，等等，“都要合乎美育的条件”。从此，我这个人和博物馆的教育与美学的方方面面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今天。另外，陈、曾、李三先生的书，除开理论方面的阐述较为单薄外，将历代“内府收藏”及其“巨帙图籍”视为我国历史博物馆之滥觞和“博物馆目录”，我看似与博物馆的界定不符。至于外国人在上海建立的两座博物馆，除有引导我国学人开始“阅读实物”，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扩大对博物馆性质的认

知及博物馆专业技术的传播外，对博物馆学理论则是比较忽视的。到了清光绪末年，一座熔历史、自然与地域民俗于一炉的私人博物馆才经张季直（睿）先生之手创建于长江之滨的南通。它是近代博物馆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第一个投影，或者可以认为是我国知识分子对“新学”的一次勇敢而成功的实践。民国肇始，在教育部管辖下，先后在北京、南京建成的历史博物馆和古物陈列所，在清皇宫旧址建成的故宫博物院，铁道管理学院兴办的学校博物馆，在南京筹办的包含历史、自然、工艺三部分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及河北第一博物院、西湖博物馆等等，并进而提出：“所谓博物馆者，不仅限于保存古物。举凡动植物、民俗、人种、教育、卫生、科学、工程、建筑、美术之类，均宜兼收并举，各建专馆。”（《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缘起》1935）因此，在发起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的人士中除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收藏家外，还有丁文江、袁同礼、梁思成、刘士桢、刘海粟、徐悲鸿等自然科学家、建筑学家和美术学家等多学科专家参加。可谓多士咸至，成一时之盛。

新中国诞生后，我读到了苏联博物馆科学研究所编著的《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这本书全面介绍了苏联“博物馆工作的理论和实际”，对50年代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地志博物馆”的性质、任务、规模、组织形式等方面，更是“奉为圭臬”，致使我国博物馆的建设走了一段弯路。另一方面，《基础》中提到的许多具有基础作用的科学工作，却又被忽略了，没有踏踏实实去做。尤应一提的是发端于“保存古物”的我国博物馆事业，并未借鉴《基础》论述的博物馆本质和作用而扩大视野，将自然的、科学

的、艺术的、文化遗址以及纪念性质的多种多样的博物馆“结合在一起，而造成它们的统一”。国家设置的管理博物馆的领导机构，除开历史文物性质的博物馆管理系统之外，其它则是归属专业领导，地质部门管地质博物馆，轻工业部门管丝绸博物馆。至于构成这些专业馆的精灵所在，即博物馆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显得十分薄弱，缺乏专业指导，更谈不到全盘规划，运筹画策了。由此看来，我国博物馆的现状，真有点与仲富兰先生在他的新著《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中对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主体的评估相近似，也是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

改革开放 20 年，我国博物馆界走出国门，接触世界博物馆的机会越来越多，由是带进来的不少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和新措施，对我们的事业确有振刷作用。在博物馆学研究方面，相继问世的论著也有几本，但大多是工作经验总结和专业技艺的传授；对博物馆学理论的研究就显得轻了些。尽管如此，近年却发现少数博物馆学家正在深入实际，埋头做调查研究，为在我们这个有着万年文明史的古老的国度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而辛勤工作着。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即将问世的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写成的《遗址博物馆学概论》。

可以看出，这本《遗址博物馆学概论》，并不是在我们之上和我们之外产生的。恰恰相反，它是我们这一代的博物馆人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特别是那些由人创造的具有社会性质的力量的认识和创新。换句话说，即是实践出理论的问题。

据说实践是一本大书，理论是一本小书。理论这本小书是在实践基础上写成的，是对实践内在规律的升华、提炼和揭示。

理论联系实际必须从两头入手，一头是努力学习已有的理论著作；一头是认真观察自己将要致力研究的实际。如果只读本本不接触具体存在，那他所谓的理论永远是一堆无用的、空洞的、没有生命力的教条，可以看出，这部《遗址博物馆学概论》，正是从这两头走拢并开拓新径的。那么，作为两头之一的这本“大书”都包罗些什么呢？

第一是本书作者们朝夕相处并为其勤恳服务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遗址。

这座占地 20 多万平方米，有陶俑、陶马近 8000 件，开馆 20 年，接待海内外观众达 4000 万人次之多，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的“20 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既是他们的工作对象、学习课堂和实验室；也是他们组织和引导众多的观众参与探索，理解两千年前的历史、政治、军事、社会制度、科技、工艺、建筑、美术、地质、地貌、水文、气象以及藏在这些背后的缔造文明的真正主人——人。秦俑馆即是这样一座如此久远、如此广博、如此深厚的遗址性的设有围墙的大学校。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除开读懂、读通遗物，用来回答秦史、秦皇、秦陵、秦俑诸方面的问题外，还必须对遗址博物馆学的思想、观念、规律、工作方法及其与其它学科的关系，进行分工很细的研究，否则就很难摆脱传统博物馆的负担。他们紧跟时代步伐，为广大观众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参与理解遗址博物馆的条件，进一步利用历史遗址的诸多特点使人们能够靠近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的秦人，并分享和接受他们的非凡创造。由是，诚如孔德 (A. Comte) 说的：“实用需要乃科学之母。”秦俑馆研究室的诸位先生便开始了一项很有科学价值的研究，这从根本上讲是将能够最充分地实现博物馆功能作为最重要的动机而开展的对他

们自己的这本“大书”进行的创造活动，其结果是一本“小书”《遗址博物馆学概论》的脱颖而出。

第二是星罗棋布在秦俑馆所在的八百里秦川的为数众多的历史遗址。

最近在《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看到，陕西全省有古代遗址 8822 处，占著录总数的 42%。其中蓝田猿人遗址、半坡、姜寨、北首岭、黄帝陵、周原、镐京、茂陵、阳陵、五丈塬、昭陵、乾陵、法门寺、大明宫、九成宫、玉华宫、耀州窑、西安城墙、碑林、西安事变旧址、华清池五间厅、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止园、金家巷、延安革命圣地等已先后建成（有几处正在筹建）遗址性的博物馆或纪念馆，向全世界开放。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人的因素。试看在这块土地上，古往今来，为着改造栖息的大地，改造社会以及改造人的素质和需求而献身的司马迁、张骞、柳公权、孙思邈、张横渠、王宏撰、李颙、李桢、李因笃、王徵、杨松轩、李仪祉、宋伯鲁、魏野畴、杜松寿、刘志丹、谢子长、井勿幕、郑伯奇、杨钟健、张奚若、吴宓等历史人物的故家、祠墓或相关的遗迹遗物，都急待博物馆科学家的调查整理，好让我们的子孙万代能够看到并有所借鉴。特别是在当前这个千军万马装点山河的旷世大工程中，尤有急促之感。这正如 20 世纪初，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Frazer）爵士就抢救民族志材料说过的一段话：“毫不迟疑地收集这些正在消失或变化的民族的充分而又精确的报导，在这些宝贵的纪念碑被毁掉之前就去记录下他们的永久复本，这是极为紧迫的，最重要的科学任务。”所谓“永久复本”，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说，我看，就是按照其原样建成的一座座遗址博物馆，而这样的博物馆，不论是已经初具规模的，还是正在筹划的，或尚沉埋地

下等待面世的，无一不是一座座“宝贵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虽是从古到今，皆以有“址”可看、可触、可读为其主要特征；但因其时代，地域、性质、内容、形式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不能“一概相量”。因此，当前在这块母土上已经或即将成长起来的遗址性质的博物馆的紧迫任务，便是遗址博物馆学的理论建设。换句话说，理论和实践虽是一体两面，但从上述陕西地区历史遗址现状来看，目前最应先着一鞭的是要从理论研究入手，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并以其原则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由是，秦俑馆的科学家们就写成了这本“小书”《遗址博物馆学概论》，用以满足当前的需要。

第三是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势头。

从 50 年代起，已有为数不少的遗址性的博物馆拔地而起，并以特有的酷似其时代、事件或人物的真实性而扩大博物馆视野，丰富博物馆教育功能，并使每一个参观者有如身临其境，一步一步走进历史，聆听它娓娓动人的讲说。例如周口店猿人洞穴、河姆渡村落、铜绿山矿冶场、避暑山庄、南京梅园新村、绍兴和北京鲁迅故居、圆明园、北京沙滩红楼、昆明西南联大新校舍等等，都是以它的实实在在的景象帮助人们认识和重睹过去的；而且是一看就懂，用不着许多文字说明或口头讲解。这里，我想起了 13 年前在黄石市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博物馆碰到的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展厅的主要部分是一个距地表 20 米、广约 800 平方米的矿坑。坑底有六十多个竖井与平巷。竖井口很小，只能容一人上下。当时，出于好奇，我就从竖井口下去，顺着平巷爬去。平巷很矮很窄，只能匍匐前行，绝无转身余地，更是无法举手挖掘。再加上巷内黑糊糊的，空气也不好。我在巷内虽只停了 5 分钟的样子，但已腰酸腿痛，熬不住了。当时我

确实是亲身感受到古代铜矿工人的苦辛，亲眼看到采矿条件的简陋。这景象，我从未耳闻目见，比起在书本上读到的更加真切动人，从而使我又一次体察到遗址博物馆给予人的教育效果是更直接些，明白些，易于接受。再回头看看我自己，真像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名作《卖炭翁》中写的“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两句，俨然就是自己的写照。正因为有过这样的一次模仿“实践”，还使我真正读懂了《卖炭翁》。我真没有想到博物馆的实物材料，竟能如此迅速地接近和了解白居易的思想感情。于是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上这样一句话：“我们十分需要遗址博物馆。”

现在，令人极为高兴和自豪的是在我们这块富饶美丽的九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先后建成许多遗址博物馆，它给我们送来了许多新思想和新观念，为我们博物馆的更易走近历史，接近群众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困难，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因此，我认为这些新建成的遗址博物馆带给我们的犹如农民在耕耘播种时的喜悦，如果要想有个五谷丰登的好收获，还必须起早睡晚，出大力，流大汗，勤灌细作。这正像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举例说的：“小小的橡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但它离不开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而这些条件已完全超出了胚胎学的范围。”由是，秦俑馆的先生们便走向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直接接触，实际观察而得到了新的认知。可以看出他们写出的这本“小书”《遗址博物馆学概论》中，就有别的遗址博物馆的投影及其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我还发现，他们是以一个博物馆人的眼光来打量遗址博物馆和其它博物馆的异同，但又能跳出博物馆，站得高高的为它立论。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它有“成一家

之言”的根据。

综上所述，这本“小书”《遗址博物馆学概论》是立足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面向三秦，致力于全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而著书立说的。它是一本深深根植于“大书”之中，理论联系实际，并为遗址博物馆学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方法，为其未来勾勒出一个纷葩烂漫的轮廓值得认真一读的“小书”。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话，目前遗址博物馆学还是一门新学问，需要对其基本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这无疑是遗址博物馆向我们这一代博物馆人提出的应该是备受欢迎的挑战。来吧，朋友们，大家动手好！

1999年春节后改稿于

法门寺—游府村——清溪傍

序二：

序　　言

苏东海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又指导实践，理论一经形成，实践就会根本改观。人类的收藏实践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直到18世纪初，尼克利乌斯的收藏品分类法和丹麦的汤姆逊分类法问世之后，欧洲人对收藏品的管理和研究才开始从自发进入自觉阶段，由此掀开了博物馆收藏科学化的新篇章。中国宋代的几部金石学著作，特别是《金石录》问世后，也开创了中国收藏品分类研究的先河。在这方面，理论的先导意义无论如何是不能低估的。

人类对遗址的研究并不久远，直到本世纪60年代，国际组织中对遗址应该由谁保护还在争论不休，以至于不得不于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把遗址保护工作从国际博协分裂出来，另组成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这个理事会实际上是教科文组织的技术咨询机构。显然，把遗址与博物馆分离开来是一种倒退，是国际博协决策中的一个重大错误。国际博协副主席帕特里克·博伊兰在纪念国际博协50周年的回忆文章中指出：“将保护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人为地割裂开，分别归属于狭义的收藏品为基础的博物馆和对历史遗址、自然保护区、古迹的保护组织，这种分裂的做法将不断削弱和

消损双方的力量。”看来国际博协的决策层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这种分裂的错误。这些年的实践也已经证明了，把遗址和博物馆分离开，不仅不利于遗址的保护，也不利于遗址博物馆的建立与发展。由于错误观点的误导，国际博物馆界对遗址博物馆的实践和研究，至少落后于中国 20 年以上。

中国遗址博物馆的实践和研究，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我在给半坡遗址博物馆写的纪念建馆 40 周年的文章中写道：“当 60 年代西方博物馆界还在争论遗址能不能进入博物馆行列时；当 1962 年 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刚开始提出建议，对遗址和景观‘应考虑建立专门博物馆’的时候，中国的半坡遗址博物馆早已把博物馆矗立在遗址之上了。那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到像半坡遗址博物馆这样建造这么宏伟的大厅把部落遗址科学地涵盖起来。这是一个创举。”半坡遗址博物馆建成后的三四十间，中国又陆续创建了几十座遗址博物馆。80 年代以来，中国遗址博物馆的实践日益丰富，遗址博物馆的研究方兴未艾，有一批相当有分量的论文出现，因此由中国率先创建遗址博物馆学是应该的。

当然创建一个学科会是一个艰巨而又漫长的过程，不仅要有丰富的实践积淀，而且要有相当成熟的理论准备。在理论准备中，至关重要的是这个学科的特性，也就是特征的提炼。特征是本质性的，其他应用性的道理是由此派生的。对特征的提炼是一个科学探索的过程。我注意到已经发表的有关遗址博物馆研究的论文中，有的已经对遗址博物馆与普通博物馆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与提炼，这是非常有益的。我对遗址博物馆既没有实践经验也缺乏理论研究，但作为博物馆学研究者，我也不揣

冒昧地对遗址博物馆的特征提出一点看法：

第一，遗址是历史的现场，历史的现场是不可再生的，因此是唯一的。除遗址博物馆外，任何博物馆都不可能真正拥有历史的现场。只有到遗址博物馆，才有可能体验到历史的临场感。临场感是借用日语的一个词，它描写观众有亲临其境之感受。在普通博物馆中，我们也可以通过文物组合布置得使人有如身临其境之感，但这毕竟是后人营造的，而非固有的。而遗址本身就是历史的现场，这种临场感与普通博物馆里营造的临场感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拥有历史的现场是遗址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遗址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遗址这个特定的时空的统一体，是一个可感知到、可触摸到的历史实体。遗址博物馆是唯一拥有时间和空间相统一的历史实体的博物馆。观众在遗址前进行历史的想象时，遗址已经为他提供了想象的时空框架。遗址提供的素材越多，历史想象的余地就越少；遗址提供的素材越少，历史想象的余地就越大。废墟提供的时空素材极少，废墟反倒可以引发无限的历史遐想。在遗址时空框架内展开历史的感知与想象，也是在普通博物馆陈列前所得不到的。因此它也是遗址博物馆所特有的。

以上两点是我的草率和粗糙的一点思考，还是不科学的表述，这里只不过是冒昧地提供给研究者的一点思索素材而已。

理论是重要的。《遗址博物馆学概论》的问世，无疑会很大地推动遗址博物馆理论的研究，进而推动遗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祝这本书取得成功。

1999年3月

目 录

序一： 大书与小书——为《遗址博物馆学概论》出版作	
 宋伯胤 (1)
序二： 序 言	苏东海 (1)
绪 论	(1)
(一) 遗址博物馆是博物馆的一支	(1)
(二) 遗址博物馆的定义	(4)
(三) 遗址博物馆的特点	(7)
(四) 遗址博物馆学的性质	(12)
(五) 遗址博物馆学的任务	(15)
(六) 遗址博物馆学的研究方法	(18)
(七) 遗址博物馆学的前途与展望	(22)
一、 遗址博物馆发展概述	(28)
(一) 博物馆的产生和发展	(28)
(二) 中国的博物馆事业	(33)
(三) 遗址博物馆的发展	(40)
(四) 遗址博物馆学的研究概况	(48)
二、 遗址博物馆的社会功能	(59)

(一) 智慧的启迪	(60)
(二) 美育的陶冶	(62)
(三) 知识的获得	(67)
(四) 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课堂	(69)
(五) 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	(73)
三、遗址博物馆的考古工作	(75)
(一) 遗址与考古	(75)
(二) 遗址博物馆考古工作的性质和任务	(76)
(三) 遗址博物馆考古工作的开展及其形式特点	(78)
(四) 遗址博物馆考古工作的类型与阶段	(81)
(五) 遗址博物馆考古机构的设置和转换	(89)
(六) 遗址博物馆考古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协调	(95)
(七) 一些特殊类型的遗址博物馆的考古工作	(99)
四、遗址博物馆藏品的管理（上）	(101)
(一) 遗址博物馆藏品的特点	(101)
(二) 遗址博物馆的藏品入藏	(108)
(三) 遗址博物馆藏品的资料搜集	(111)
(四) 遗址博物馆藏品的鉴定	(141)
五、遗址博物馆藏品的管理（下）	(145)
(五) 遗址博物馆藏品的管理	(145)
(六) 遗址博物馆藏品的编目、建卡建档与建账	(151)
(七) 遗址博物馆藏品管理手段的科学化、现代化	(182)
六、遗址博物馆的文物保护	(192)
(一) 文物保护在博物馆工作中的地位	(192)
(二) 遗址博物馆文物保护的特点	(194)